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

明代文学卷

抉精要以会通

陈广宏 郑利华 编选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

明代文学卷

抉精要以会通

陈广宏 郑利华 编选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挾精要以会通/陈广宏,郑利华编选.—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7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明代文学卷)

ISBN 978-7-100-15488-8

I. ①挾… II. ①陈… ②郑… III. ①中国文学-古
典文学研究-明代-文集 IV. ①I206.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395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挾精要以会通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明代文学卷

陈广宏 郑利华 编选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488-8

2018年5月第1版 开本710×1000 1/16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张23.5

定价:65.00元

前 言

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的开始,追溯起来,应当至1917年国文科的建立,迄今一百年;而中国语言文学系作为系科,则成立于1925年。1950年代之后,汇聚学界各路精英,复旦中文成为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始终处于海内外中文学科的最前列。1980年代以来,复旦中文陆续形成了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1981年)、古籍整理研究所(1983年)、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2005年)、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4年)等新的教学研究建制,学科体制更形多元、完整,教研力量更为充实、提升。

百年以来,复旦中文潜心教学,名师辈出,桃李芬芳;追求真知,研究精粹,引领学术。复旦中文的前辈大师们在诸多学科领域及方向上,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他们在学问博通的基础上,勇于开辟及突进,推展了知识的领域,转移一时之风气,而又以海纳百川的气度,相互之间尊重包容,“横看成岭侧成峰”,造成复旦中文阔大的学术格局和崇高的学术境界。一代代复旦中文的后学们,承续前贤的精神,持续努力,成绩斐然,始终追求站位学术前沿,希望承而能创,以光大学术为究竟目标。

值此复旦中文百年之际,我们编纂本丛书,意在梳理并展现复旦中文传统之中具有领先性及特色,而又承传有序的学科领域及学术方向。其中的文字,有些已进入学术史,堪称经典;有些则印记了积极努力的探索,或许还有后续生长的空间。

回顾既往,更多是为了将来。我们愿以此为基石,勉力前行。

陈引驰

2017年10月12日

出版说明

本书系为庆祝“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百年”所策划的丛书《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之一种。该丛书是一套反映复旦中文百年学术传统、源流，旨在突出复旦中文学科特色、学术贡献的学术论文编选集。由于所收文章时间跨度大，所涉学科门类众多，作者语言表述、行文习惯亦各不相同，因此本馆在编辑过程中，除进行基本的文字和体例校订外，原则上不作改动，以保持文稿原貌。部分文章则经作者本人修订后收入。特此说明。

编辑部

2017年11月

目 录

明代的文人集团	郭绍虞	001
明代的文学与哲学	章培恒	062
从明人对杜甫的评价看明代诗学的风尚	刘明今	077
明代青阳腔剧本的新发现	赵景深	090
明代演剧状况的考察	赵景深 李 平 江巨荣	104
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	章培恒	129
关于《金瓶梅》词话本的几个问题	黄 霖	149
从《金瓶梅词话》与《水浒》版本的关系看其成书时间	谈蓓芳	174
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	章培恒	186
何景明批评论述评	朱东润	201
阳明心学与文学复古运动	马美信	209
试论冯梦龙的小说理论	陆树仑	220
汤显祖的诗文理论	邬国平	232
试谈公安派的性灵说	吴兆路	242
论江盈科参与创立公安派的过程及其地位	黄仁生	254
竟陵诗论	郭绍虞	265
苏轼诗文与晚明士人的精神归向及文学旨趣	郑利华	275

述钱牧斋之文学批评	朱东润	300
《列朝诗集》闰集“香奁”撰集考	陈广宏	315
彭士望的诗集、诗论与诗作	周兴陆	342
我怎样写作《张居正大传》的	朱东润	355
编后记		368

明代的文人集团

郭绍虞

—

先从标榜风气说起。

明代文人集团的发达,从那一方面可以看出来呢?这,即从明代文人标榜风气的发展,已可看出其端倪。大抵既有文人集团,则“七子”“四杰”之称自会随之以兴;而一方面有了这称“七子”“四杰”的名号,也自会促进集团的发展。所以用此测量文学风气与集团组织之盛衰,即是比较正确而便捷的尺度。标榜之风,固然古已有之,然而于明为烈。明代文人只须稍有一些表现,就可加以品题,或且树立门户。

其以地域称者,则有:

吴中四杰 高启、杨基、张羽、徐贵(见《明史·文苑·高启传》)

会稽二肃 唐肃、谢肃(见同上《王行传》)

闽中十才子 林鸿、郑定、王褒、唐泰、高棅、王恭、陈亮、王偁、周玄、黄玄(见《明史·文苑·林鸿传》)

东南五才子 王洪、解缙、王偁、王璉、王达(见《静志居诗话》)

台州三学 张穀(古学)、方孝孺(正学)、王叔英(静学)(见《全浙诗话》)

娄东三凤 张泰、陆钺、陆容(见《明史·张泰传》)

- 苕溪五隐 刘麟、孙一元、龙霓、吴琬、施侃(见《静志居诗话》。案:《金陵诗征》有陆昆无施侃)
- 广陵十先生 储瓘、王軌、景暘、赵鹤、朱应登、蒋山卿、曾铎、朱曰藩、宗臣、桑乔(见同上)
- 江北四子 景暘、蒋山卿、赵鹤、朱应登(见《明诗综三十三》)
- 吴中四才子 徐桢卿、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见《明史·徐桢卿传》)
- 金陵三俊 顾璘、陈沂、王韦(见同上《顾璘传》)
- 江东三才 顾璘、刘麟、徐桢卿(见《静志居诗话》)
- 浙江四子 鄞张琦、海盐张宁、余姚魏瀚、嘉善姚绶(见《全浙诗话》)
- 楚中三才 童承叙、张治、廖道南(见《静志居诗话》)
- 锡山四友 施渐、王懋明、姚咨、华察(见《静志居诗话》)
- 练川三老 唐时升、娄坚、程嘉燧(见《明史·文苑·唐时升传》)
- 嘉定四先生 程嘉燧、李流芳、娄坚、唐时升(见同上)
- 明州四杰 朱应龙、沈明臣、叶太叔、卢沄(见《静志居诗话》)
- 云间二韩 莫云卿(廷韩)、顾斗英(仲韩)(见《笔精》)
- 苕溪四子 茅维、臧懋循、吴稼澄、吴梦旸(见《列朝诗集》)
- 吴下三高 朱鹭、王在公、赵宦光(见《静志居诗话》)
- 娄东二张 张溥、张采(见《明史·文苑·张溥传》)
- 南州四子 刘斯陞、李奇、邓履中、余正垣(见徐巨源:《南州四子传》)
- 贵池二妙 刘城、吴应箕(见《静志居诗话》)
- 山阴二朗 朱士稚(朗诣)、张宗观(朗屋)(见同上)
- 北田五子 何绛、陶璜、梁桂、陈恭尹、何衡(见《广东诗粹》)
- 东湖三子 赵涣、吴易、史玄(见《明诗纪事》辛签)
- 太仓十子 周肇、王揆、许旭、黄与坚、王撰、王昊、王忬、王曜升、顾湄、王搢(见《梅村文集》)

范围缩得小一些,则以社所称之,如:

北郭十友 亦称北郭十才子 高启、张羽、徐贲、王行、高逊志、宋克、唐肃、余尧臣、吕敏、陈则(见《明史·文苑·王行传》)

南园五先生 孙蕡、王佐、黄哲、李德、赵介(见同上《孙蕡传》)

碧山十老 秦旭、陆勉、高直、陈履、黄禄、杨理、李庶、陈懋、施廉、潘绪(见张恺碧《山吟社记》)

东庄十友 吴燿、文徵明、吴奕、蔡羽、钱同庆、陈淳、汤珍、王守、王宠、张灵(见《静志居诗话》)

南园后五先生 梁有誉、欧大任、黎民表、吴旦、李时行(见《南园后五先生集》)

几社六子 夏允彝、杜麟征、周立勋、徐孚远、彭宾、陈子龙(见杜登春《社事始末》)

其以时代称者，则有：

景泰十才子 刘溥、汤胤绩、苏平、苏正、沈愚、晏铎、王淮、邹亮、蒋忠、王贞庆(见《明史·文苑·刘溥传》)

嘉靖八才子 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熊过、任瀚、陈束、李开先、吕高(见同上《陈束传》)

以官职称者，则有：

中朝四学士 詹同、吴沈、乐韶凤、宋濂(见《明诗纪事》甲签)

两司马 王世贞、汪道昆(见《明史·文苑·王世贞传》)

东海三司马 范钦、张时彻、屠大山(见《甬上耆旧集》)

三翰林 杨廷麟、倪元璐、黄道周(见《西江诗话》)

以师门关系称者，则有：

二玄 周玄、黄玄——皆林鸿弟子(见《明史·文苑·林鸿传》)

杨门六学士 张含、杨士云、王廷表、胡廷禄、李元阳、唐铎(见姚莹《识小录》)

杨门七子 上述六学士外加吴懋，皆杨慎在滇时从游之士(见同上)

以家庭关系称者，则有：

武原双丁 丁麒与弟麟(见《明诗综》)

嘉禾二王 王鏊与弟钧(见同上)

三李 李文彬、弟文昭、子伯震(见《明诗纪事》甲签)

山阴二王 王谊与弟择(见同上乙签)

吴兴二唐 唐率与弟广(见同上)

二苏 苏平与弟正(见《两浙名贤录》)

双璧 沈玮与弟琛(见《全浙诗话》)

皇甫四杰 皇甫冲与弟洙、沆、濂(见《明史·文苑·皇甫洙传》)

三张 张凤翼与弟燕翼、猷翼(见同上)

公安三袁 袁宗道与弟宏道、中道(见《明史·文苑·袁宏道传》)

四公子 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冒襄(见《清先正事略》)

此外，或泛加品题，如：

四杰 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祯卿(见《明史·文苑·何景明传》)

七才子 上四人外，加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见同上《李梦阳传》)

十才子 上四人外，加康海、王九思、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见同上)

十才子 高濂、傅汝舟等皆从郑善夫游者(见《静志居诗话》)

四大家 顾璘、陈沂、王韦、朱应登(见《明史·文苑·顾璘传》)

五子 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见同上《李攀龙传》)

七子 上五人外，加徐中行、吴国伦(见同上)

或齐名并称，如：

三杨 杨士奇、杨荣、杨溥(见《明史·杨溥传》)

二王 王直、王英(见同上《王直传》)

二峰 林贵兆(白峰)、叶敬之(海峰)(见《三台诗话》)

王唐 王慎中、唐顺之(见《明史·文苑·王慎中传》)

三甫 余曰德(德甫)、张佳胤(肖甫)、张九一(助甫)(王世贞诗谓吾党

有三甫)

四甫 上三人外,加魏裳(顺甫)(见《四库总目提要》一七八)

归胡 归子慕、胡友信(见《明史·文苑·归有光传》)

钟谭 钟惺、谭元春(见同上《袁宏道传》)

唐刘毛蔡 唐之淳、刘绩、毛铨、蔡庸(见《全浙诗话》)

刘王郑李 刘绩、王谊、郑嘉、李勗(见同上)

平居陈郭 平显、居广、陈谟、郭文(见《静志居诗话》)

李何王李 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见《明史·文苑·李攀龙传》)

章罗陈艾 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艾南英。亦称江西四家(见同上《艾南英传》)

这些都是文人标榜之例。至如讲学家之“何黄”(何廷仁、黄弘纲)、“钱王”(钱德洪、王畿),书画家之“二宋”(宋克、宋广)、“三宋”(上二人外,加宋隧)等,还不计在内。明代文人标榜之风之盛,也于此可见了。其尤甚者如李梦阳有《九子诗》,皆诗文之友,李开先亦有《九子诗》,自称是诗文而兼经济。至如王世贞于其集中标举生平交游,有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递推递衍,以及于四十子,而复于王锡爵与其弟世懋称为二友,则更见其标榜之私。唐人虽亦颇有此种风气,如胡震亨《唐音癸签》所举,也不在少数,但是若与明代相比,则远不如。所以即就这一种风气而言,已可看出明代文人集团之发达。

二

明代文人集团何以会这般发达呢?

这自有其原因。我们可以从当时集团的性质,分别说明他的原因。

其一,是基于明代文人的生活态度。我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讲到明代风气的时候,就曾这样说过:“明代学风也是偏于文艺的,可是又不像元代这般

颓废和放纵。这好似由西晋名士的狂放行为,转变而为东晋名士的风流态度。”真的,明代文人,大都风流自赏,重在文艺切磋而不重在学术研究。易言之,即大都是“清客相”而不是“学者相”。这是明清两代学风绝不相同的一点。因此,借了以文会友的题目,而集团生活却只是文酒之宴,声伎之好;品书评画,此唱彼酬,成为一时风气。而此种风气,实在还是受了残元的影响。顾德辉之玉山雅集,其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暨饴馆声伎,固然冠绝一时(见《明史·文苑·陶宗仪传》)。即徐一夔之聚桂文会,一时名士以文卷赴者五百余人,也可谓极一时之盛(见朱彝尊《曝书亭集·徐一夔传》)。他如曹睿之倡景德诗会,缪思恭之倡南湖诗会,亦均留唱和之集(见陈田《明诗纪事》甲签十一)。而方朴、郭完诸人之壶山文会,尤盛于闽中(见《明诗纪事》甲签十五)。所以结社风气,在残元已很为流行。《明史·张简传》称:“当元季浙东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聘一二文章巨公主之,四方名士毕至,宴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可知此风已甚普遍,不过是属临时性质,并无固定的社员而已。至于当时杨维桢之生活态度,如《明史》所载:“徙居松江之上,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酒酣以往,笔墨横飞。或戴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辞,自倚风琶和之。宾客皆蹁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二八五卷《文苑传》)这更是明代文人的标准典型。所以风气所播,即在明初已有不少的文人集团。何况,再有许多达官贵人,也喜欢附庸风雅,于退休里居之余,以高年硕德为文坛祭酒,怡老崇雅,兼而有之,似乎也是人生一种乐趣。于是九老十老耆英之会也相继以起。所以由明人的生活态度言,是文人集团发达的一个原因。

其二,明代文人的治学态度与学术风气也不能无关系。我在《文学批评史》下册中又说:“正因明代学风偏于文艺的缘故,于是‘空疏不学’四字,又成为一般人加于明代文人的评语。由于空疏不学,于是人无定见,易为时风众势所左右。任何领袖主持文坛,都足以号召群众,使为其羽翼;待到风会迁移,而攻讦交加,又往往集矢于此一二领袖。所以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为此关系,所以出奴入主,门户各立,主张互异,又形成了明代

文坛空前的热闹。盖他们只在文艺上讨生活，于是也只能在文学批评上立坛站。范景文《葛震甫诗序》云：“往者代生数人，相继以起，其议如波；今则各立门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拟古造新，人途非一；尊吴右楚，我法坚持。彼此纷嚣，莫辨谁是。”（《范文忠公文集》六）这真是当时整个文坛的缩影。到此地步，文坛变成了党团，只有异同，没有是非。全祖望《环堵集》序谓：“其盟主几若齐秦之欲自帝于东西。署置同事，名曰首勋；摈排异己，谓之屏放。狂惑至此，播为乱气。”（《鮑埼亭集》外编二十五）在此种情形之下，不是如徐渭这般不参加集团以示消极反抗，也只有另立门户以表示积极反抗了。所以就明人的学术空气言，又是促成文人集团发达的一个原因。夏允彝《岳起堂稿》序谓：“唐宋之时，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其起也以多延奖，其合也或赆文以献，挟笔舌权而随其后，殆有如战国纵横士之为者。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其起也以同声相引重，其成也以悬书示人而人莫之能非。故前之贵于时也以骤，而今之贵于时也必久而后行。”（《陈忠裕公全集》卷首）这话，也有相当理由。正因其权在下，而“今之贵于时也必久而后行”，所以文人也不得不另想一捷径。而结社标榜，却正是当时适合环境需要的捷径。

再有，那就是结社的实用性与政治性的关系了。结社动机，假使真出于丽泽商兑，研究古学，那么，文酒风流，还不会有很多的流弊，同时，也不会起别的作用。无奈当时的集团，有的在结合之始，只为制举业的关系，那么其动机只在仕进，就不能说有很高的理想了。《明史·袁宏道传》称：“宏道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城南，为之长。”不曾说明这是那种性质的社；但在《公安县志》中却称其“总角，工为时艺……年方十五六，即结文社于城南，自为社长，社友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那么，这即是攻研时艺的集团了。当时像这类的文社，实在也不在少数，只因时起时灭，所以不为人所注意。除了一些社稿的序，见于文集中以外，其余大都是不可考的。不过这些专研时艺的文社虽不尽可考，但其量则不会很少。正因专研时艺的文社之多，所以有些与书铺有关的“坊社”，请了一班制艺名家，主持选政，揣摩风气，也会盛极一时。这些为了仕进而

组织的集团,不免预先存着推挽汲引之心,由推挽汲引而结党营私,由结党营私而把持排挤,都是很自然的归束。不必说什么,即在复社也不能免此弊,何况如阮大铖这辈小人所组织的“中江社”和“群社”呢。所以当时正人有集团,即小人也有集团;恬退者有集团,躁进者也有集团。至于,有了结合以后,受到时代的激荡,不免发些正义感的呼声,于是就由学术性的团体转变而为政治性的团体。在起初,不过随便加些批评指摘,发些正义感的呼声罢了。但是正义感的呼声,总不免为有些人所忌,于是加以诬蔑,加以名目,送他一顶帽子,好为一网打尽之举。却不知名目一加,声势更盛,于是政治性的倾向反更为明显,黄宗羲《明儒学案》之序“东林学案”云:“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其为讲院亦不过一郡之内耳。昔绪山二溪,鼓动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设教,可谓之标榜矣;东林无是也。京师首善之会,主之为南皋少墟,与东林无与;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逆阉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俗者,无不谓之东林。若是乎东林标榜,遍于域中,延于数世。东林何不幸而有是也,东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则东林岂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东林如是,号为“小东林”的复社也未尝不是如是。方其初,本不成为一伟大的集团,有作用的集团,只因统治者本身起了腐蚀,引起一般人的指摘,而再意图诬蔑,加以名目,于是声势转盛,清议也发生了力量。凡是稍有正义感的都聚到一边;凡是为清议所指目的,几乎不敢同他接近或合作,这已使统治者感到很大的威胁了。不要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文人集团到此,自会起巨大的作用。所以由结社的实用性言,热中躁进者需要有集团;由结社的政治性言,砥节厉行者也需要有集团。这更是文人集团发达的一个原因。

三

文人集团的性能既已说明,于是可再一言明代文人集团风气之演练。

我们推溯到文人集团之缘起,已可看出文人集团可能具有这几种性能。第

一种是学术性。曾子谓：“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可说已认识到集团组织的需要。这种集团只以取友为目的，相互作用学问上的砥砺；因为不如是则离群索居，很容易陷于孤陋寡闻的。明代文人的集团组合，差不多大体都是以此为目的。至于标榜以盗取声名，推挽以攘夺禄位，乃至诋排以角立门户，那都是一种副作用。所有万历以前的文人集团，都不外这一个目标。不过，中间再有个分别：洪武以后，景泰以前，只是兴趣的结合，不管是窗下切磋用以攻文也好，或是林下逍遥用以娱老也好，总之既无党同伐异之见，更不论及国事。这是第一期，而以后各期中仍沿续着这种情形。天顺以后，万历以前，派别渐滋，门户亦立，于是始成为主张的结合。固然，因个性的关系，大同之中不能无小异，但是，各人总有共同的信条，也有共同的作风，不能算是无目的组合了。所不同于以后一期的，只是不带政治性而已。这是第二期。——然而在第三期中也依旧可以看出这种风气的持续。本来，在明太祖高压政策之下，生员是不许干政的。《松下杂钞》卷下称洪武二年诏天下立学，遂命礼部传谕，其中有一条谓：“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今后生员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报告。其事不干已，辄便出入衙门，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纠众扛帮，骂詈官长，为首者问遣，余尽革为民。”（《涵芬楼秘笈本》）以这样的政治压力，再明了人的生活态度，当然只成为有闲阶级的集团，只成为消遣性质的脱离现社会的集团。这不但是文人的集团是如此，即当时讲学家的集团也未尝不是如此。待到政治本身日见腐蚀，于是讲学家不得不发言了，于是文人也不得不发言了。这在以前，如后汉之党锢，差不多也有这种情形，《后汉书·党锢传序》说：

及汉祖杖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凌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仇，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

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

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纓纓，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他所分的四个时期：第一期，任侠之方成其俗，虽是有组织，却不是文人。第二期，守文之徒盛于时，虽是文人的党同伐异，然而不能说有组织。第三期，去就之节重于时，虽知道对于政治的不满，然而只是消极的反抗，属狷性的而不属狂性的，是个人的行动而不是集团的表现。直到第四期，婞直之风于斯行，刚才可说有集团的组织而且也表现了集团的力量。所不同的，只是没有集团结社之名而已。所以每逢到“主荒政谬”，自然会引来“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自然会“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的。而在此种情形之下，则“激扬名声，互相题拂”，也属当然的情形。当时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称，也即因此而起。所以学术性的文人集团固可以标榜，政治性的文人集团也一样会标榜的。明代到了天启、崇祯之间，受到阉党的刺激，始于上述两种风气之外，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也就与当时实际政治不能脱离关系了。这是第三期。——同时也是明代文人集团行动最值得注意的是。

四

现在，先讲洪武至景泰间——第一期——的社事。

第一期的结社，大都沿袭元季风气，文采风流，照映一世。举其著者，吴中则有北郭社，粤中则有南园社，闽中则有十子社。此外，则是老年文人的结合，大都仿白居易之香山社，文彦博之耆英社，以怡老为目的，而兴之所至，也不妨从事于吟咏。兹依次述之于后。

【1】北郭社

北郭社以高启为中心。高启，字季迪，长洲人。《明史》二八五卷《文苑》有传。启送唐处敬序云：“余世居吴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交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已。十余年，徐君幼文自毗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处敬自会稽，